

书卷上再现战争罪恶

本报记者 姜燕

日本战犯在回国后,纷纷撰写回忆录,并结集出版,一本名为《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的书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后,顿时成为畅销书,随后在大陆印行了中译本。而杨克林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一书,也于1994年在日本出版,以客观、真实、全面获得日本学界好评。

日文《三光》曲折出版路

《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书的作者都是日本投降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拘留的战犯,原文是在1955年前后写成的,约有150篇。

“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在《三光》的后记中写道,战犯们回国后不久,由光文社神吉晴夫出版了一本精装本的《三光》,立刻成为畅销书,但是马上受到右翼的破坏,在市面上看不到了。

《三光》在日本原来计划分两集出版。第一集的15篇在1982年由日本东京光文社以《三光》(新编)为名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个月里连印6次。日本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推荐,日本名作家小田实曾发表题为《这正是我们日本人必读的

记录》评论。

1982年夏天,森村诚一先生写的《恶魔的饱食》出版,轰动一时。但是不久,便发生了《恶魔的饱食》的照片误用问题。大致在同一时期,新编《三光》上发表的照片中有一张被指明“有错误”。趁此机会,右翼势力又猛烈攻击,新编《新光》第一集只好从市场上收回。此时,第二集虽然已经完成了第二校,但因上述事件而终未得见天日。

后来,几经周折,才在时隔第一集出版两年后的1984年,由晚声社将第一、二集合并,出版了全版的《三光》一书。

战犯自己撰写真心认罪

“我们到东京时,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富永正三带了一本日文版的《三光》,我也带了一本中文版的《三光》,虽然不约而同,但是想法不同。”杨克林说,他看过三光后,对里面的内容还有些怀疑,因为内容不仅真实揭露了日军侵略暴行,每个人在文末的感悟也对自己的行为深刻反省。

“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是认罪的书,我怀疑这些是否真的是他们自己写的,是否他们内心所想。”杨克林特地请富永正三在中文

版《三光》上签名,他很快地签了,并表示这完全是战犯们亲自撰写,里面的观点和认识也是他们的真心所想。杨克林说,他们还比对了书中的内容,两者基本是一致的。

在中文版《三光》的“校者说明”显示,日本出版全本的《三光》时,将第一集的《胎儿》《军需工厂》《群鬼》《良民证》《窒息》五篇删去,原因可能是没有搜集到执笔人的感悟。在译成中文时则无此顾忌,将这五篇一并译出。这是两书的不同之处。

富永正三感叹:“战犯们的回忆录冠以《三光》之名问世,一想到这恐怕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不禁有些感慨。”

“不会反省的民族”何时改变

日本作家、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为《三光》写的序言里,将日本称为“不会反省的民族”。他写道,如果日本人要带着这种不会反省的精神,和世界其他民族友好共存下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反省”是什么意思呢?那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谢罪”是什么呢?那也是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的概念。如果对不伴随行动的“反省”或“谢罪”下定义的话,那就只能是“免罪符”。

富永正三在写给友人的信中

说,“我们得到的认识是,首先,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该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

他提到,再次出版《三光》新编的原因是,在全世界“反核”、“裁军”的潮流中,高喊着在低速发展下再建财政和紧缩财政的日本政府,却单单对防卫预算加以特别处理,显得十分突出,煽起了战争的危机感。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号召怀念“军国日本”的电影《联合舰队》《大日本帝国》等。

究竟日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我们这些干过战争暴行的人回忆当时战争的体会,来暴露战争的罪恶,使战争的罪过不再在我们第二代人身上重演,另外,控告当时使我们陷入那种局势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然存在,也就是对现在的当权者的警告。这就是本书出版的原因。”

本多胜一认为,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的日子是否能来,取决于这样的幼芽是得以成长还是被摧残。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曾出日文版

1992年,杨克林和曹红夫妇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同年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于1994年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100多页,图片3000余幅,解说文字约70万字。为了编这套书,杨克林夫妻俩准备了10年,曾远赴日本、美国等地收集资料,先后采访了400多位历史见证人。

陈香梅女士为这套书写序。蒋纬国先生在看过这套书后,给杨克林去信称赞:

“大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内容丰富,堪称图文并茂。记述着炎黄子孙在抗日御侮中血泪斑斑事迹,令人读后深

刻体认,一个国家人民必须团结,始能富强,再不虞外人所侵袭!”

1994年由日本著名出版社柏书房出版发行了日文版,受到了日本进步学者的一致好评。

“当时是日本第一次发行中国出版的大型抗战书籍,这个出版社是比较学术化的,他们认为这本书全面地讲述了这场战争,和日本人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要让日本人看一看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对教育日本民族很有意义。”杨克林说。杨克林去日本时得知,日本一个地方上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买了一套,但因为里面的图片太血腥,他不敢带回家去,怕家里人看了觉得怎么日本人做了这么多坏事。

日本人对这本书感到很震撼,因为是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日本有关方面还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国官方,表示注意到我们出了这样一本书。日本右翼分子对这套书的出版十分不满,派人到日本的出版社丢石头,挑书中的毛病,试图抓住“小辫子”,提到一张照片有误,但杨克林查证后认为照片无误。

将中国的抗战放到世界大背景下

在出版以后,杨克林和曹红仍继续拾遗补缺,采访了海峡两岸和现居海外的400多位参加抗日战争的将军、战士和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特别是收集到许多抗日英烈照片,如江上清、吕公良、宋诗安等。

2005年,杨克林为《中国抗日战争图志》补充了许多新增史料,并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着眼,将图书更名为《世界抗日战争图志》,图片增加到5000余张,共1677页,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它从日本侵华史、日本侵略东北亚和侵略东南亚史、从十九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幕幕纷繁复杂、丰富深刻的历史场景。



(上接 A9 版)

内心难解歉疚

这批战犯回国后,拒绝领取日本政府发给军人的转业费,在他们的想法中,他们参加的是侵略战争,犯下大罪,不应拿补贴。

许多人和土屋芳雄一样,撰写回忆录或出书,向外界讲述日军侵华暴行,表达自己的忏悔。在此过程中,得到过不少支持,但也受到右翼分子的污蔑和威胁。

土屋芳雄从1969年起,开始写忏悔录。被《朝日新闻》山形分社记者得知后,将他写的文章于1984年3月-1985年4月在《朝日新闻》山形版上,以题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的笔记形式连载。这些记事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从日本各地来的匿名信和明信片多得数不清。有的鼓励他要有勇气,敢于揭露侵华战争的罪行,但也有人对他进行卑劣的中伤和诽谤。

中归联编写的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三光》一书,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下,出版历程也十分曲

折。第一集在日本出版后即受到了日本极右势力的破坏,第二集未能按计划出版。后来,几经周折,才在时隔第一集出版两年后的1984年,由日本晚声社将第一、二集合并,出版了全版的《三光》一书。以至于陪同杨克林采访的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说:“《三光》是在社会上遇到不幸运的一本书。”

被宽大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努力用各种行动忏悔他们的罪过,因为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年老去世,他们发展了一些年轻人,加入到中归联,当时在广岛等地陪杨克林等采访的就是两个新加入者,一个是1955年出生的相扑运动员由木柴司,另一个是1941年出生的摄影记者新井利男。

虽然有战犯曾前往中国,寻访被他们杀害的人的家属,甚至一次又一次跪在大雪中乞求原谅,但他们的内心仍然被罪行深深束缚,认为难求中国人民的谅解。杨克林发现,不少战犯家中,都有中国留学生寄宿,这些学生大多只知道他们曾是军人,对隐情一无所知。

他们对内心的拷问丝毫未减

本报记者 姜燕

杨克林,1958年出生,上海人,曾是一名军人,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编辑过《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等书,20多年来,他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抗战史料。1995年10月前往日本,采访日本战犯,积累了大量视频资料。

记者:您为什么想到去日本采访战犯?

杨克林:我以前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编过一本《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在国内采访过不少抗战老兵。但是,我想应该更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不能只有我方抗战的记录,还要有侵略者一方实施侵略的材料。除了纸质的史料外,还应该日本战犯的口述历史,通过镜头,用讲述的方式揭露日军暴行,是更为有力的证据。

记者:您是怎样联系到日本战犯的?

杨克林:我知道他们回国后成

立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来又通过朋友联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所长金源,这些战犯中的很多人和他都有联系,他们非常感激他当年的教育和照顾,把他当成父亲一般。他知道后很热情地帮我联络这件事,并亲自陪我们去日本。日本战犯们都也非常积极,都想面对我们的镜头讲一讲,但有些年纪实在太大了,行走不便,我们在日本的时间也非常短,只有10天左右,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记者:您见到这些战犯,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克林:见到他们之前,心里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因为知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罪行,想着他们都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魔头,内心的痛恨在所难免。但是见到他们之后,看到的是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他们对当年犯下的罪孽深深忏悔,讲起来无不痛哭流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对内心的拷问丝毫不曾减轻。

记者:这次中央档案馆公布了45名战犯的笔供后,很多人质疑,他们罪大恶极,为什么不判处他们重刑。您怎么看?

杨克林:对,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入的。我认为释放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他们留下来,比判处他们死刑要好得多。为什么这么说?这些战犯在刚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态度是极其强硬的,根本不认为他们是侵略战争,看不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育之后,他们的立场转变了,明白了自己曾经参与了一场多么无耻的侵略战争。与其让他们带着仇恨去死,不如让他们背负着忏悔去向身边被蒙蔽的日本人解说,讲出这场战争的真相。虽然他们的力量不可能消除日本右翼势力,但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真相。